

第五章

进入新时代：

向民族主义和团结的过渡

1910年是暹罗华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对华人友好的朱拉隆功王在这一年驾崩，他的儿子瓦奇拉乌地登基，这是一位浪漫的民族主义者、反华的倡议人。这一年在曼谷也发生了不幸的华人大罢工，“华人问题”因而真正被提出来。而且，1910年是标志着一个大约15年转变时期的中点时间，这个转变时期由于几个重要的发展事件而引人注目。引起中国革命的种种事件、华人创办第一批中文报纸和华人社会的学校、建立新型的华人社团、取消专利包税权和三年一度的人头税、秘密会社的衰落——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暹罗华人转入一个新时代。

第一节 华人民族主义的兴起

暹罗华人民族主义感情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也具有重大的意义。1895年中国被日本打败后澎湃涌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迅速在东南亚发生影响，而中国民族主义特定的组织形式——保皇党和革命运动——也反映到海外的华人社会。南洋的革命运动中心是在新加坡，在孙逸仙于1905年6月抵达新加坡之前这里已创立了一家宣传革命运动的报馆。^①新加坡第一批革命运动拥护者之一的沈联芳，在曼谷设立其公司的一个分行，部分原因是为着招募革命运动的支持者。^②受他影响的人中有陈绎如——现在他是华人社会的“老前辈”之一，在辛亥革命前几年即剪掉辫子，以宣示自己的转变。

^① Huang Fu-luan, *Hua-ch'iao yü chung-kuo ke-ming* (Hongkong, 1954), pp. 63~64.

^② 这一章的大部分资料，是根据当时参加者而至今仍生活在曼谷的人们所提供的。

不过,在暹罗公认的革命领袖是萧佛成,^①他的背景使他特别适合扮演这个角色。萧佛成的祖先于明亡后即参加反清活动,最后逃到台湾在国姓爷(即郑成功——译者)的领导下继续作战。清朝占据台湾后,萧家中佛成这一系逃到马六甲,大约两个世纪后,这个家族的一部分人来到曼谷。萧佛成成为曼谷有名的商人和律师,当马六甲的友人使他对革命运动产生兴趣时,他的全部影响和才能都为革命事业服务。

1905年冬,萧佛成和数位党徒同香港一家同情革命的报纸——《中国日报》——发生接触,要求帮助他们在曼谷设立一家宣传革命的报馆。隔年,沈荇思、陈景华和萧佛成一起创办了《美南日报》。总编辑陈景华是广东香山县(孙逸仙出生的县份)人,^②在逃亡到暹罗前,曾担任广西某县县长。^③由于缺乏经费,该报不久即陷入困境,重新改组,采用一个与原来名称意思相同而头一字不同的报名,即《湄南日报》。不久,有一位拥护康有为的广东人到暹罗来,赢得《湄南日报》半数理事的支持,改组这个日报为《启南日报》,成为保皇党的机关报。萧佛成与陈景华于1907年大胆地创办一个新报纸,可算是曼谷早期最成功的出版事业之一。这个报纸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中文的《华暹日报》,另一种是泰文的《中暹日报》(*Jinno-sayam Warasap*);分别由陈景华和萧佛成(及其女儿)^④担任编辑。泰文版于1908年被称为是“公正和高度独立”的。^⑤中文版则较强烈地反映着支持者的革命抱负。

1907年孙逸仙先生派遣汪精卫到暹罗,按照1905年在新加坡建立第一

① 西方人通常称他为 Seow Hood Seng,这是按照福建音写成的。

② 广东人是曼谷新闻事业的开辟者。在《湄南日报》出版之前有记载的日报只有《汉境日报》和《同侨日报》,都是广东人创办的企业。

③ Huang Fu-luan, *Hua-ch'iao yü chung-kuo ke-ming* (Hongkong, 1954), p. 76.

④ 这种叙述主要根据 Hsieh Yu-jung, *Siam Gazetteer* (Bangkok: Nan-hai t'ung-hsün-she, 1949), pp. 283~284, 301~302. 因为 Hsieh 对于直至1918年为止的新闻事业发展的看法,比起下列作者著作中的看法较为准确,如 Li P'iao-p'ing, "Hsien hua hsin-wen shih-yeh Hsiao-shih", *Second Anniversary Public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Printers Association of Siam* (Bangkok, 1948): 8; Feng Yzu-yu, *Hua-ch'iao ke-ming k'ai-kuo shih* (Chungking, 1946), pp. 52~53; Huang Fu-luan, *Hua-ch'iao yü chung-kuo ke-ming* (Hongkong, 1954), pp. 75~76. 显然,这些作者中有些人把《湄南日报》的成立与《华暹日报》的成立混同起来。

⑤ Arnold Wright and Oliver T. Breakspear, eds.,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Siam: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1908), p. 295.

个南洋分会的方针，建立同盟会分会。汪精卫完成了他的任务，在成立会议上，萧佛成、陈景华和沈荇思分别被选为主席、秘书和财政委员。^①不久，也建立中华会馆作为地下组织的公开群众组织。1908年冬，孙逸仙本人在胡汉民、胡毅生、何克夫、卢仲琳的陪伴下，从新加坡来到曼谷。数百名华人，包括许多著名的商人，在中华会馆馆内举行欢迎会。隔天，暹罗政府在英国公使的警告下，通知孙先生必须于一周内离开暹罗。但是美国公使以孙逸仙是夏威夷居民为理由进行干涉，因此，出境期限延长一星期。孙先生在暹罗停留的十天中——结果这成为他唯一访问暹罗的一次——拟好了将来策略和经费来源的各种计划。从此以后，支援革命的款额都通过曼谷的批局汇给广东的胡汉民。暹罗同盟会的组织更为紧密，并调整为新加坡同盟会南洋总部的一个支部。^②在以后的三年时间中，围绕着几个内地城市的私营商业公司成立了很多革命小组。在受到来自槟榔屿的刺激下，第一批书报社在暹南建立起来，这些书报社成为内地国民党各种外围组织的通常名称。

虽然在同盟会曼谷支部的会员中有不少过去是洪门会的成员，但它决定不通过暹罗秘密会社来进行工作。据称，孙逸仙先生讨厌秘密会社的臭名声和腐败的特性。不过，在某种情况下，也试图改革和改组某些洪门“公司”使其成为革命组织。本书第四章第二节中所提到的两个敌对的客家人集团（即“明孙”、“群英”两派的争斗——译者），就是在同盟会会员余次彭的调解下团结起来的，因而有可能在1909年组成亲革命党的客属会馆。^③同年，琼岛会所也建立起来，并成为同盟会及同盟会后身——中华革命党^④的外围组织。按语系集团组成的分立组织均遵照1909年胡汉民在新加坡制定的新方针行事。^⑤海南人在新加坡是五个语系集团中最弱的一个，因而便与潮州人合组成一个帮，但是曼谷的海南人是有足够力量组成自己的帮会的。在暹罗最早的政党活动家中，很多都是海南人。

① Huang Fu-luan, *Hua-ch'iao yü chung-kuo ke-ming* (Hongkong, 1954), pp. 75~76. 并参阅 Feng Yzu-yu, *Hua-ch'iao ke-ming k'ai-kuo shih* (Chungking, 1946), pp. 52~53.

② 有些报道说，在1908年孙中山的访问前，同盟会没有正式成立起来。

③ “Pen-hui tsu-chih yen-ke”, *Hsien-lo hua-ch'iao k'e-shu tsung-hui erh-shih chow-nien chi-nien-k'an* (Bangkok, 1947), p. 1.

④ 中华革命党于1910—1911年在暹罗发出的会员证称为“中华国国民军凭票”。

⑤ Feng Yzu-yu, *Hua-ch'iao ke-ming k'ai-kuo shih* (Chungking, 1946), pp. 69~72.

1908年在曼谷成立的中暹银行,似乎也与革命事业不无关系。这家银行的资金,主要是由大部分出资经营香港大米贸易的当地碾米厂商和商人所提供的。这家银行也为革命提供基金,其营业的稳固是与孙逸仙的成功相关连的。随着袁世凯的胜利和1913年孙逸仙逃亡日本,人们对革命党失去了信心,导致这家银行完全失败;这个不幸伤害了在暹罗的革命运动,并造成曼谷严重的金融危机。^①

反革命派在曼谷的活动,一直延续至辛亥革命以后。保皇党的报纸——《启南日报》出版不到一年就停刊,但保皇党的党徒仍继续反对孙中山的革命运动。1909年春,《华暹日报》的重要后台老板马兴顺因事前往潮州,暹罗的保皇党分子即把他到潮州的消息电告广东总督。马兴顺即被当为革命党分子加以逮捕监禁,而陈景华不得不到香港去料理他的释放问题。^②1912年,曼谷华人的保皇党分子创办《中华民报》,与萧佛成的报纸进行了好几年你死我活的笔战。

中国的政治因而对泰国中文报的正常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动力。到1918年时,曼谷前前后后曾有过六七份中文报纸。不过,当时显然是革命情绪占优势的,因为当时出版的三家报纸——广东人创办的《侠报》、《华暹日报》和《中华民报》——都发表社论支持孙逸仙的国民党革命运动。

曼谷第一所华人学校,也是为中国的政治利益而建立的。1909年至1911年间,同盟会直接地或通过其外围组织——中华会馆,成立好几个读书社和华益学堂。保皇党分子也成立自己的“读书社”和中华学校,与之对抗。其他好几所学校也在一两年后相继成立。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新民学校也是在同盟会赞助下成立起来的。^③

暹罗华人方面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自然是伴随着与祖国的联系加强而来的。清朝政府为了苟延残喘,终于在其朝代的最后几年中采取某些措施,来取得海外华侨的支持。1907年一个声势十足的商务考察团,在两艘巡洋舰的

① Arnold Wright and Oliver T. Breakspear, eds.,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Siam: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1908), p. 165;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Siam Consular Report* (1909), p. 11; W. A. Graham, *Siam* (London: Alexander Moring, 1924), p. 343.

② Feng Yzu-yu, *Hua-ch'iao ke-ming k'ai-kuo shih* (Chungking, 1946), p. 53.

③ Hsieh Yu-jung, *Siam Gazetteer* (Bangkok: Nan-hai t'ung-hsün-she, 1949), p. 294.

护送下到暹罗访问^①,此后多次企图同暹罗谈判缔结条约。1909年,清朝政府颁布第一个《中国国籍法》,规定中国父母的后代都是中国公民——这是一个有意使“当地出生华人免受外国统治”的举动^②。1910年新的大清律例终于取消了移民禁令,这个禁令早已成为一纸具文,但仍成为返国华人和政府官员之间经常发生摩擦的根源。清朝政府方面这些过时的举动,加上孙逸仙对海外华人所表示的关心,使暹罗华人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得到共和国政府真正的保护。华人第一次把中国政府看成本国的政府。

总结说来,暹罗华人民族主义增长的重要结果,有如下几点:加强与祖国的联系,创办中文报纸和华人学校,增加华人在泰国国内的政治活动,以及出现了为整个中国事业而消除华人在当地社会的内部分歧的趋势。华人社会对其中国特征和国籍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第二节 华人问题

从泰人方面来说,他们的民族主义精神在20世纪前20年期间也有了发展。在拉玛五世整个统治时期泰国上流社会的青年不断地增加,他们在西方人于暹罗所办的学校里受教育,且被派遣到欧洲留学。他们不仅认识到现代民族主义的意义,而且认识到在欧洲国家中民族主义与种族成见的密切关系。不用说,在暹罗,华人和泰人这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种族接触所引起的定型化作用,由于这两个种族的职业区分而尖锐起来了。华人喜欢称泰人为“野蛮人”,而泰人却认为华人是粗野的。^③不过,这些定型和偏见具有的政治的重要性,还是出现在泰国的上流人士从西方吸收了民族主义之后。例如,泰人从西方人那里真正认识到他们国家的历史:在19世纪转入20世纪期间,暹罗的上流人士通过与西方学者的接触,知道他们的祖先是从中国移民过来的,以及

① Virginia Thompson, *Thailand, the New Siam* (New York: Macmillan, 1941), p. 108.

② Chutung Tsai, "Chinese Nationality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 (1910): 407.

③ Kenneth P. Landon, *The Chinese in Thailand*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1), pp. 20~21.

在更早之前他们的祖先为了摆脱中国的统治,而争取独立的斗争。^①在欧洲,他们认识到种族中心主义的政治规模,并第一次接触到反对犹太人和黄(即华人)祸的学说。最重要的是,他们亲眼看到欧洲人在暹罗对华人的不友好态度。

欧洲人反华对泰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发展的影响,从未有过恰当的评价。这里不想分析西方人这种态度的来源,这也许是由西方人与华人作为商业竞争者或低级的雇员接触的性质引起的。^②要说明暹罗欧洲人的反华偏见,最好引用19世纪转入20世纪期间两位著名泰国政府顾问的话。华灵顿·斯迈斯(Warington Smyth),泰国皇家矿业部的英人顾问,于1898年写道:

除了具有不可否认的高度能力外——他的能力也许可与水牛相等,我对华人苦力没有很大的钦佩。

华人……是暹罗的犹太人。……他们完全享受着免受官方干涉的特权,这种特权是他们既不应得也不加以重视的。他们的唯一利源,是仿效其他各处华人秘密会所采取的各种高压的粗暴方法而得来的。……华人通过巧妙地运用他们的商业才干和结合能力,把暹罗人掌握在手中。政府对华人的容忍是由于恐惧;华人在政府官员面前毕恭毕敬,背后却讥笑这些官员;他们能够在一天中劫掠半个曼谷。^③

泰国政府的教育顾问坎贝尔(J. G. D. Campbell),也将华人比作犹太人,并认为“喜欢安静的[泰]人……实际上为了贪图优游过活,而把其生存权利出卖给他们[华人]”。他以欧洲人的立场写道:“不能把他们‘华人’受欧洲人的雇佣说成是华人对欧洲人有很大的好感,而只是由于需要的面前没有选择……他们把这当作必须忍受的不幸。”^④

在19世纪转入20世纪期间,华人遭受到大部分英属国家的排斥,黄祸在有远见的欧洲人中是一种严重的事情。许多欧洲人由于华人流入暹罗而感到

① S. H. Parker, "Siam", *Imperial and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Vol. 4 (July 1897): 114~115; Phra Sarasas, *My Country Thailand* (Tokyo: Maruzen, 1942), p. 167.

② 暹罗的西方人中,英国人似乎表现得最敌视华人,而美国人表现得最少。这种差别大部分一定是由于这样的事实:英国居民几乎都是同华人竞争的商人;而大多数美国居民是传教士,他们在华人中或许找到最有效的工作园地。

③ H. Warington Smyth, *Five Years in Siam*, Vol. 1 (London: John Murray, 1898), pp. 320, 285~286.

④ J. G. D. Campbell, *Sia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2), pp. 270~274.